

杭州“2008《儒藏》主编工作会议”综述

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和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继续教育中心共同主办的“儒学典籍的现代诠释与《儒藏》主编学术研讨会——2008《儒藏》主编工作会议”，于2008年11月8-9日在浙江大学邵科馆举行，教育部社科司杨光司长、北京大学张国有副校长、浙江大学罗卫东校长助理以及50多位《儒藏》部类主编和学者出席了会议。经部礼类、经部孝经、群经总义类主编及负责人因故未能参加。

大会首先由《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儒藏》总编纂汤一介教授作报告。汤先生首先介绍了《儒藏》精华编编纂与出版的进展情况，即到目前为止，已收到校点稿212部，其中90%的稿件完成初审，60%的稿件完成通审，有100多部稿件已发稿，正式出版了8册；韩国、日本、越南方面的《儒藏》编纂工作也在顺利进行。汤先生说，从已经出版的几册《儒藏》来看，在底本的选择、校勘的审慎以及印刷的质量方面，都很不错。接着，汤先生重点谈到了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活动，即走访了多个合作单位，与校点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很多问题通过讨论而得到了妥善解决。汤先生认为，这种交流和沟通的工作方法非常好，有利于我们的工作。针对《儒藏》工程目前存在的困难，汤先生还特别吁请教育部领导继续支持《儒藏》工程的工作，加大经费的投入力度。最后，汤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肩负这样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我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浙江大学校长助理、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罗卫东教授在致辞中结合他个人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科研经历，谈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可比性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而指出，儒家文化传统对人类未来将具有多种可能的价值，因此，研究和编纂儒家的经典有着重要的意义。罗教授还表示，浙江大学对《儒藏》工作是很支持的，他向汤先生、向教育部领导表态说：“我们还会进一步支持《儒藏》编纂工程。”

接着，教育部社科司杨光司长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强调《儒藏》工程作为重大工程的性质。杨司长指出，《儒藏》这个项目不是一般的项目，而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文化工程，是为传承民族精神和中华文明，为实现我们民族的复兴，在学术文化建设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第二，肯定了《儒藏》工程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仍然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杨司长说，四年来，《儒藏》工程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

模,并在出书和育人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目前也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任务还很艰巨。杨司长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要“拿出来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精品,拿出来能对得起我们伟大时代的学术精品”。最后,杨司长表示,教育部社科司会尽最大的努力继续支持《儒藏》工程,进一步加大在经费和行政协调上的支持力度。他说:“在适当的时候,社科司会出面把参与到这项工程里的有关学校、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如何在政策和资金等各方面给予支持。”

实际上,在会前的11月7日晚上,杨光司长在宾馆与汤一介先生见面时,就说到教育部社科司将会对《儒藏》工程大力支持,他向汤先生表示:“经费方面,教育部一定继续大力支持。这样大型的文化工程,不是五年十年的事,国家必须长期支持下去。”

北京大学张国有副校长在讲话中重点阐述了《儒藏》工程进行中几个特别重要的因素:第一,我们有一支集合了国内外顶尖学术人才的通力协作的队伍。第二,资金是保证我们这项工程能够运行的基本条件,需要有资金方面的支持。北京大学会在保证资金方面尽最大努力。第三,要有坚持不懈的信心和一贯的努力。张副校长说:“有些事情并不在于说它多么伟大,关键在于能不能做下去;有些事情尽管很伟大,但是如果中途而废,就会一事无成。”第四,要有一个良好的组织工作。为此,他十分赞成杨光司长关于明年由社科司来牵头和各个高校的主管领导商量如何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决定。

随后,《儒藏》总编纂、北京大学孙钦善教授作了题为《慎定底本,精校异文》的发言。他说:《儒藏》质量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恰当地确定底本,精确地校定异文。从前段工作来看,更换底本的情况较多,在已收212部稿件中,更换过底本的有29部。孙先生强调说,底本一定要选好,“善本就是比较完足、错误率小、文字较接近原著面貌的本子”。因此,要做版本调查,对版本进行比勘,进而精确地校定异文。孙先生结合很多实例来说明,异文的情况往往复杂,要靠古文献学,特别是小学的学识作正确的判断,要多查字典,审慎判断,切忌想当然从事。

会议第二阶段,各部类主编对相关工作完成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作了报告。汇报经部编纂进度情况的共有六位学者。山东大学林忠军教授汇报易类进展情况说,在总共34部著作中,已交23部,未交及需换底本的12部,预计明年四五月份全部完稿。吉林大学吕文郁教授汇报了书类26部书的完成情况,已有25部完成初稿,而版本问题费了不少周折。吕教授指出,通过前段时间的工作,深深感到由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承担校点任务,功底薄弱,经验不足,反映出培养人才的迫切性。同时,吕教授还表示,希望吉林大学能在经费和政策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山东大学王承略教授就诗类、讖纬类书稿进展情况作了汇报:诗类21部中已交16部,讖纬类已经全部交稿。王教授指出,他多年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总结出的经验就是,底本选择是校点工作的“重中之重”,底本选择前必须经过初校,经过校勘,选择善本;选好了底本,要先用铅笔标点,确定后再用红笔圈定。王教授认

为,通过这项工作,要培养出既能整理又能研究的人才。中国社科院姜广辉研究员就春秋类书稿进展情况作了汇报。春秋类 25 部书是由社科院历史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上饶师范学院三个单位承担,已经确定校点者的有 19 部,其中已经完成的有 70%,质量不够理想。姜先生认为这项工作不仅整理了成果,而且培养了人才。他希望,为了保证质量,加快进度,教育部要加大投资力度。中国社科院陈静研究员汇报了四书类孟子属、四书总属书稿进度情况:她所负责 10 部书稿,已交 4 部,其他几部还在进行中。陈先生表示参加这项工作也是一次学习,所以每次中心下发的纠错之类的文件他们都认真学习,以避免出现同样的错误。吉林大学陈恩林教授报告了小学类进展情况。小学类 5 部书去年 9 月份已经全部交稿,但目前有 4 部已经返回修改,主要涉及底本调整和体例问题。陈教授指出,这次会议明确了标点和校勘要严格要求的原则。他希望今后加强交流。

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就史部目前进展作了汇报。张教授说,2006 年 11 月,他接手史部之后,首先对史部选目作了调整——史部有 50 部书,现在已换了 8 部。收入了《资治通鉴纲目》和《续资治通鉴纲目》,去掉了《宋朝诸臣奏议》和《尽言集》,增入了《明臣奏议》、《贞观政要》、《为政忠告》、《宋名臣言行录》,《温公年谱》改换为清人顾栋高之作,又把范邨鼎编的《理学备考》换成了张伯行编的《伊洛渊源续录》。张教授表示,今年,大部分书稿还处于做样稿、摸底本的阶段,力争在 2009 年、2010 年完成,希望史部不会拖整个《儒藏》工程的后腿。

汇报子部编纂进度情况的共有五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张树业博士代表周桂钿先生汇报了周秦诸子类儒家之属的校点情况。在周教授主持的 4 部书中,《孔子家语》已提交《儒藏》中心,《曾子》已完成初稿,《孔子集语》已基本完成。苏州科技学院朱友华教授汇报了儒学类经济之属的校点情况:21 部书稿中已交 16 部,另 5 部将于 2009 年上半年之前陆续交稿。朱教授指出,作为全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有大局观念;确保质量,确保进度,应成为共识。中山大学张丰乾教授汇报了性理之属明代部分的校点情况,由于人员变动和工作中的问题,中山大学的进度一直不太理想,13 部书稿中已交并通过初审的只有 1 部,这次会议带来了 3 部新完成稿,年底还会交七八部。张教授特别提到,《儒藏》工程规模大,其他正在申请立项的项目在信息方面要加强沟通,避免整理研究的重复性。湖北社科院张艳国研究员汇报说,儒学类礼教之属的校点已基本完成,主编冯天瑜先生严把第一道质量关,不合格的书稿不交中心,先退校点者修改。首都师范大学邓球柏教授汇报了杂学类 9 部书稿的情况,9 部书稿已全部完成,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人物志》因退改两次考虑换校点者。邓教授希望中心能明确退稿的处理方案。

共有六位学者汇报了集部稿件的进展情况。南京大学孙亦平教授说,汉唐部分 8 部书目前已有 2 种书经过了初审环节,一种通过了,一种退回,另外有 3 种书提交了样稿。针对《儒藏》中心与校点者在个别书稿处理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孙教授表示会顾全大局,

与中心协调处理好这个问题。浙江大学陈俊民教授汇报了北宋部分书稿进展情况,21部书中已交7部,已出版1册2部,2010年能够全部交稿。陈教授反映影响进度的因素,一是校点者比较分散,组织困难,二是有些标志性人物的文集还没有找到理想的作者。华中师范大学王玉德教授就南宋书稿情况作了汇报,南宋部分总体进度已经过半,但任务还很艰巨。王教授指出,高校现行的有关科研成果的认定评价体系不利于点校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罗超教授就金元部分13部文集进展情况作了汇报,他认为目前进展不理想,争取2010年上半年全部完成。罗教授与与会代表交流了他们整个团队的经验,一是参与校点的教师全是《全元文》的编委,有丰富的整理经验;二是底本选择有整理《全元文》时打下的较好的基础,尽量不使用《四库》本。他同时也提到了阻碍工作进展的主要问题是学校重视支持不够,一是年终考核,北师大现行的考核体系对《儒藏》校点工作不利;二是学校没有配置经费。浙江大学董平教授汇报了明代集部31部书稿的情况,除了2部尚没有落实校点者,其他大多已交稿。董教授还提到某些书稿在版本问题上的特殊情况,并希望中心在做决定时能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南开大学赵伯雄教授汇报了清代部分稿件情况:承担30部,13部已交稿,5部在审查中,11部在校点中,1部需要更换校点者。赵教授还详细地谈了三个问题:一、信用问题。赵教授说,校点者可以失信于中心,中心不可以失信于校点者,中心宽大为怀,校点者才有信心。二、版本问题。赵教授说,我们做的是一套大丛书,它与做一本书不一样。为此,赵教授认为,翻来覆去地强调版本并不恰当,只要找一个较好的本子就可以。他认为,现在如此强调版本,要求越来越高,已经违背了《儒藏》编纂的初衷。三、校勘问题。赵教授主张不必广搜异本,出校也不必过多,校勘记的写法要给作者一点自由,要有发挥的余地。

华东师范大学严佐之教授汇报了朱熹及相关著作23部书稿的进展情况,指出了目前影响进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学者承担科研任务多,不能集中全力投入校点工作。

此次会议,韩国、日本、越南三国的代表也汇报了《儒藏》韩、日、越之部的编纂情况。韩国中央大学梁承武教授报告说,韩国部分《儒藏》精华编选目工作经过28次编纂会议以及与北大《儒藏》编纂中心的讨论,正在相当充实地开展进行。韩国部分选目也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其中经部共选49部,史部12部,子部45部,集部46部。梁先生希望《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可以通过文化和道德创造对人类做出贡献,也借此实现儒家思想的体系化、现代化、大众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日本二松学社町泉寿郎副教授代表户川芳郎先生报告了日本部分《儒藏》编纂工作进度。日本部分共收40部有代表性的文献,初步估算,经部11册,史部3册,子部1册,集部1册,以经部为核心,史部、子部、集部为辅翼的四部分类体系选目。町先生说,这种按中国传统学术体系汇编日本儒学文献的做法在日本还从来没有过,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创新。而且这40部选目中还包括过去从来没有刊行过的稿本,这些稿本著作,无论从资料方面,还是从内容方面,均可刷新大家对日

本儒学的看法。越南河内国家大学阮金山教授作了越南方面书籍校点情况的报告,他说,越南方面拟选儒学书籍共十部,即《易肤丛说》,《书经衍义》,《春秋管见》,《论语愚按》,《芸台类语》,《群书考辨》,《方亭随笔录》,《圣训家训》,《族约家规》,《孝经立本》。其中五个部分已校点完成,计划至2009年4月全部完成。阮教授说,越南部分编纂工作存在的困难是:大部分典籍是手写或孤本,俗体字、异体字或讳字、讳名等和中国典籍不一样,作品中有一些遗失或模糊不清的字。

11月9日下午,大会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座谈发言。座谈主要围绕大家普遍关心的几个议题展开。

针对前阶段书稿的质量问题,三位审稿专家从审稿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看法,其中校点者的工作态度问题较为突出。中华书局张忱石编审指出,有的校点者不太认真,使用了不合规则的符号,还有漏点页数情况。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剑雄编审也指出,有些校点者的书稿采用不同颜色的笔迹,不规范的符号,有的把底本的原字涂掉,使审稿人很为难。中华书局的骈宇騫编审也反映说,有的校点者对审稿人指出的错误不通改,只改个别已指明的错误,三番五次,态度很不认真。骈先生因此建议主编不可把不成熟的稿子仓促交上来。

主编、校点者、中心工作人员、审稿专家,四方如何加强沟通与协商的问题颇受大家关心。李明友、骈宇騫等先生认为,校点者交稿后,中心审稿意见反馈到校点者,这之间的互动过程需要进一步完善,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电话、网络和中心走访各单位都是很好的方式。吕文郁先生还建议审稿人实行实名制,在审完稿件后署名,留上联系方式,以便校点者对审稿意见存疑处有更方便的沟通。严佐之先生补充说,对不同的问题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对老先生、老专家,语气和态度都应该温和一点。

版本与校勘体例问题仍是大会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为此,孙钦善先生重申,确定一个好的本子,可以省却很多校记,“慎定底本”不是广校众本,也不是一定要求旧本,而是要大致有一个比勘和判断,找出较好的本子;“精校异文”就是不要改错了底本的文字,不要用后人的错误意见来改动原本正确的底本。孙先生强调说,《儒藏》工作进行到现在,没有改变初衷和体例,没有提高要求,而是要保证起码的要求;校勘记的写法可以有浮动,但是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度,不能离谱。张忱石先生也说,不需要把所有版本都找齐,也不必都用来校勘,但是首先要有一个版本的调查,找出几个主要的本子,确定一个好的本子,再参校一二个较好的本子就行了。北大出版社马辛民先生从出版的角度指出,体例是必须遵守的,希望体例能统一规范。严佐之先生也认为,《儒藏》编纂的初衷和原则现在还是没有改变。严先生还针对赵伯雄和王承略先生讲到丛书和单书做法不一样的问题提出看法说,《儒藏》作为丛书固然不同于一般单书精校的做法,但是也不能沦为一般的参考书,还是要争取做成能被后人引用和依靠的善本丛书。

《说文段注》的校勘作为一个校勘问题的个案,在座谈会上被多次谈到。陈恩林先生提出,《说文段注》一书(样稿)的校点者针对段注引文中存在的问题,为之增补篇名、卷数和内容,并相应地用方括号([])标示,这种校勘是否应予以保留?赵伯雄、李剑雄、骈宇騫等先生均认为这个做法不符合《儒藏》体例,或超出了《儒藏》工作的范围,应该割舍。

座谈会结束后,汤一介先生作了总结发言。汤先生总结说,这次会议“是一次有成果的,有意义的,有希望的会议”。成果有三个方面:一,教育部领导对《儒藏》工程作了充分肯定,并明确表示将加大支持力度。二,主编们提出了非常多的好的意见。三,韩国、日本、越南学者的校点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汤先生提出,《儒藏》工程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出成果,二是出人才,三是出经验。汤先生还就怎么进一步做好《儒藏》提出了九点看法,他要求进一步明确校点者是第一责任人;要求从原则上按照校点体例做;不要直接用现在出版的整理本作底本;电子版的稿件要保证错误率在万分之一以内,并同时交底本复印件;各部类主编要审查书稿;争取进一步解决经费问题;要和校点者补签一个合同。最后,汤先生还讲到中心的工作,肯定了中心工作人员的辛苦和困难,并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向各位主编表示歉意。

大会最后,陈俊民和李明友先生致闭幕辞。陈先生认为,《儒藏》工作已经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攻坚阶段,一个初见成果的阶段。他还说:“我们从事的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性的历史使命,我们站在这么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所以我们应当有互相理解和包容的态度。”陈先生坦言,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我们的理想是每个人都想得到最后的定本,都希望搞好这一项工作,但是由于各方面的限制,都可能出现错误。最后,陈先生感慨地说,我们是一支承担着历史责任的、难得的学术团队,所以大家都要互相珍惜。李先生认为,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信心。李先生建议《儒藏》主编会议还是一年一次地进行下去。

会议期间,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还介绍并演示了《儒藏》中心针对《儒藏》具体工作设计开发的《儒藏》工程网络管理系统,并就《儒藏》中心书稿处理工作流程(包括初审、通审、退改、退稿、发稿、复校、复审、终检等环节)、校点费支付相关情况做了简要说明。

此次会议,是一次提高《儒藏》编纂水平和质量的会议。大家普遍感到《儒藏》工程进入了比较关键的阶段,都决心做好下一步工作,以确保《儒藏》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进一步明确了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对于会上各位主编所反映的个别性的问题,《儒藏》编纂中心表示将在会后及时以适当的方式予以答复。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整理)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杨光司长 在杭州“2008《儒藏》主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8年11月8日

尊敬的汤先生，

尊敬的张校长，

尊敬的各位主编、专家学者：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次《儒藏》编纂主编会议，也可以借这次机会跟大家见个面。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儒藏》编纂会议，以前都是我们司里其他同志参加的。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沟通，也来听取各位专家学者就如何进一步做好《儒藏》的编纂工作、就我们如何提供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首先我代表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向汤先生、向编纂《儒藏》辛勤工作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来主持整个“《儒藏》编纂与研究”这个项目，把这个项目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攻关课题，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设立的一个最大的文科项目。目前，教育部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建立了一个基金，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项目体系。我们有重大攻关项目、基地项目，还有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包括规划项目、青年项目），还有后期资助项目等等，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体系。但是一般来说，这些项目的经费支持力度都不是很大。重大攻关项目经费是30万元至80万元左右，这就算是最大的项目，每年大概40项左右，一般2-3年完成。但是《儒藏》项目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延续时间比较长的重大立项。我们把《儒藏》这个项目称之为“工程”，就说明这不是一般的项目，是一项重要的工程，是为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中华文明，为实现我们民族的复兴，在文化建设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高度地重视这个项目，我们也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地进行，而且能够做好。由于《儒藏》工程项目规模比较大，涉及面广，学术性、专业性都非常强，不是一所学校所能够独自承担完成的，所以我们在立项通知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北京大学和首席专家要能够认真组织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联合攻关——我们习惯地称之为“四跨”，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力争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此，我们曾经两次专门给教育部所属的《儒藏》工程合作单位下达文件，要求他们能够采取切实的措施，对这项工作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从运作的情况来看，《儒藏》工程确实是按照

教育部的要求,很好地实现了“四跨”的要求,特别是在国际合作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四年来,经过北京大学和各合作单位以及数百位专家学者的艰苦努力,《儒藏》工程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在出书和育人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海内外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应该说,这些阶段性的成果来之不易,是在克服了很多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虽然我们的条件不是很具备,特别是和其他一些大的工程项目相比,我们在客观方面的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一些,但是,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些成果来之不易,让人感佩。

我们也知道,《儒藏》工程目前进展顺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困难,任务还很艰巨。困难主要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工程规模比较大,组织的难度比较高,目前有国内外 30 多个高校和科研机构,300 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工作,所以要把这么多的专家学者组织好,协调好,工作量是比较大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希望各位专家,各位主编,能够同心协力,把这项工作做好,大家团结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克服困难,一起来克服困难,把这件事情办好。第二是这项工作主要是整理校勘古老的儒家的典籍,是一项学术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这些典籍都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精华,所以整理的质量要求很高,我们必须拿出来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精品,拿出来能对得起我们伟大时代的学术精品。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出于种种考虑而做出不太负责任的东西,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必须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时代,对得起后人——要拿出这样的精品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工作的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第三,我们的这个工程还是一项国际合作的项目,这增加了组织与编纂工作的难度。最后,《儒藏》的经费也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我们教育部社科司有责任来继续支持,尽最大的努力来支持《儒藏》工程的继续进行。虽然这其中困难,但是我们有信心,能够做得更好。为了保证《儒藏》工程的质量和进度,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上述各个方面继续努力地提供支持和服务。

古籍校勘的学术含量和专业要求都是很高的,刚才汤先生也讲了,不亚于撰写学术论文,甚至不亚于撰写一部学术专著,实际上这其中的学术含量是很高的。昨天我拜见汤先生,听汤先生讲,这个古籍的校勘工作不只是做一些句读,还需要很深的学术功底,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做一部高水平的古籍整理本,是足以扬名,足以传世的。所以我们希望各有关单位能够采取切实的措施,对工程的参与人员给予更多的支持、理解和帮助,尤其是在参与人员学术成果的认定方面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昨天晚上,我拜见汤先生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今天早上我和张国有副校长也谈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想在适当的时候,把参与到这项工程里的有关学校、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希望他们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怎么样能够尽量在政策上、各方面给予支持。大家共同努力,再经过几年的努力,起码把 461 种“精华本”搞出来。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儒藏》工程在经费上

的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大在行政协调上的支持力度,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有责任。同时,我们要确保《儒藏》工程的质量和进度,最终要能够将《儒藏》真正铸造成一部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传世精品。所以昨天汤先生也说了,我们希望能够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精益求精,尽可能地加快《儒藏》编纂进度,以适应我们国家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新形势的需要。

大家都期许着《儒藏》工程能够成为一项盛世修典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成功的范例,也希望通过这个工程能够为建设一个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和谐社会做出文化方面的贡献。

最后,我向在座的各位主编、各位专家学者,向所有参与《儒藏》工程的各位专家学者(包括今天没有到会的)表示衷心、诚挚的祝愿。祝愿《儒藏》进展顺利,早日大功告成!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甘祥满整理)

慎定底本 精校异文

孙钦善

《儒藏》精华编采用校点的方式进行整理。校勘方面的成败,或者能否超越已有的前人成果,关键在于能否恰当确定底本,精确地校定异文。底本的确定尤其关系到全局,底本如选择不当,肯定全盘皆败,要彻底进行返工。从前段工作来看,在底本选择方面,经过改动的颇多,具体情况如下:

《儒藏》精华编现收到稿件共 212 种,更换过底本的书共有 29 种,占稿件总数的 13.7%:

No.4 孔颖达《周易正义》。原拟用注疏合刻本,校点者提出用宋监本,属单疏本,王弼《周易注》另收入第一册。宋监本从文字上看远胜于阮本。

No.5 李鼎祚《周易集解》。最初用嘉庆张海鹏照旷阁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和卢见曾《雅雨堂丛书》本作校本。初审人阅校语,觉得张海鹏照旷阁本尽管出自卢本且加校订,然翻刻不精,新增加的错误比较多,大量的校记反映出两种校本的文字都优于底本。退改时建议校点者换用校本之一作为底本,校点者很快换用《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后通审专家认为还是卢见曾《雅雨堂丛书》本为优,于是又要求校点者更换底本。二次换底本时特别叮嘱校点者最终决定权在校点者,因为三个本子的情况他最熟悉,而依《儒藏》体例凡校本误者不出校,单纯看校记判断未必可靠。校点者最终换用卢见曾《雅雨堂丛书》本为底本,另两种版本为校本

No.6 王弼、韩康伯《周易注》。原拟用注疏合刻本,校点者提出孔颖达《正义》用宋监单疏本要远胜于阮本,故注疏须分别选定底本。后《周易注》选用《无求备斋易经集成》影宋本为底本,但中心发现此本文字较《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劣,故建议校点者更换底本,现正在商讨中。

No.16 杨万里《诚斋先生易传》。原以明尹耕刻本为底本,后更改为《中华再造善本》所影印宋张敬之校正本为底本,该本题《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

No.36 孔颖达《尚书正义》。原以影印清阮元刻本为底本,后改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宋元递修)为底本。

No.48 王夫之《尚书引义》。原以守遗经书屋刻《船山全书》本为底本,后改为以湖南博物馆所藏船山五世从孙嘉恺钞本为底本。

No.68 王夫之《诗广传》。原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清同治四年湘乡曾氏金陵节署刻本为底本,校以中华书局王孝鱼校点本。根据原稿所出校记,以及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诗广传》校语,湖南博物馆所藏王夫之五世祖从孙王嘉恺抄本《诗广传》在文字上优于其余诸本。经中心与校点者商定,前往湖南博物馆过录王嘉恺抄本作为底本。另外,中华本系后人整理本,仅供参考,不宜作为校本,故删除。

No.78 王应麟《诗地理考》。校点说明中称以元刻明补的《玉海》本为底本,但实际用的是较易得的浙江书局本,名不副实。后改为以《玉海》本作底本。

No.79 韩婴《韩诗外传》。最初采用清赵怀玉校本作底本,中心提议改换较早的本子。后改用以明苏献可通津草堂本为底本(此本据元代至正十五年刊本重新校刻),并采用另一系统的明本——薛来芙蓉泉书屋本为校本。

No.89 敖继公《仪礼集说》。原以四库本为底本,后校点者认为荟要本经过精心校勘,错误较少,故改为以荟要本作底本。

No.110 吕祖谦《春秋左氏传说》。此书现存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本、《金华丛书》本。校点者原用《四库》本作底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为校本。审稿人指出《通志堂经解》本时代最早。第二次交稿时,校点者以《通志堂经解》本作校本,但未以其为底本。审稿人又根据校记指出,《通志堂经解》本中原有很多“夷狄”字样,四库馆臣均做了删改,很多是整句的改换。从四库馆臣对南宋著作的一贯做法来看,《通志堂经解》本显然是更接近原貌的本子。所以建议校点者以《通志堂经解》本作底本。

No.112 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首次交稿,用《四库》本作底本,以《亭林遗书》本等版本作校本。审稿人指出《校点说明》未交代版本源流及优劣,未说明以《四库》本为底本之理由。校点者修改后交回,未更换底本,但《校点说明》交代了版本源流,并称《亭林遗书》本最好。审稿人再次指出,既然《亭林遗书》本最好,应用作底本。

No.124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原以四库本为底本,但于“违碍”之词删改颇多。后改为以现存最早的国图藏明翻宋本作底本。

No.167 真德秀《四书集编》。原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后改为以康熙十九年刻《通志堂经解》本作底本。

No.245 孔鲋《孔丛子》。原以《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为底本,后经中心建议,改为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为底本。宋刻本在文字上更优。

No.248 桓宽《盐铁论》。原以《四部丛刊》影印叶氏观古堂所藏明弘治涂氏江阴刻本为

底本,然《四部丛刊》所收并非真正的涂本,而是嘉靖时的翻刻本,前人已辨其非。建议改用真正的明弘治十四年涂刻本作底本。

No.249 刘向《新序》。中心初审退改时建议使用宋刻本作底本。

No.298 王夫之《思问录》。最初校点者迳将岳麓整理本复印、修改交来。后改为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光绪二十四年《王船山先生四种》本为底本,但从校记情况来看,此本错字很多,如“全”误作“金”,“于”误作“子”,“佚”误作“俟”之类,说明以此作底本并不妥。后建议改用道光二十七年听雨轩本为底本,此本年代既早,文字亦优,可避免出很多异文校记。

No.316 刘昼《刘子》。原以明刻孙鑊评两卷本为底本,此本属节本,抄配太多,经中心与校点者协商,改用民国十三年海宁陈氏影宋本为底本,以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此本年代最早,然有残缺,特别其中卷一至二是拿明刻本配的)为校本。

No.318 应劭《风俗通义》。校点者最初采用明覆刻元大德本为底本,但实际上《四部丛刊》所收即元大德本(据铁琴铜剑楼藏本影印)。从校记来看,有很多元本不误之处被明覆刻本误刻、误改,故最后改用《四部丛刊》影印元大德本为底本。

No.321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最初以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本为底本,但此本刊出后黄汝成于道光十六年又做了修订,撰成《续刊误》二卷,西溪草庐据此成果又于道光十八年剜改十四年刊本而重印,因此道光十八年本代表了《集释》的最终刊定的面貌。故最后改为以道光十八年西溪草庐重印本为底本。

No.327 陆贽《陆宣公文集》。校点者最初选了一个和刻注本作底本,中心认为不当选带注本,且又有宋本传世,可以依据。后校点者与中心协商,决定以《四部丛刊》所收宋本为底本,用国图藏宋本及民国董士恩《陆宣公全集》本作校本。

No.353 岳飞《岳忠武王集》。此稿《校点说明》称所用底本为单恂刻本,实际所用为《丛书集成初编》本。《初编》本系据《艺海珠尘》本排印,《珠尘》本又据单恂刻本翻刻,所以校点者将二者混为一谈。中心已代为过录上海图书馆藏明单恂刻本,提供校点者作为底本。

No.356 汪应辰《文定集》。校点说明称以武英殿本为底本,实际交来的底本是《丛书集成初编》据《聚珍版丛书》排印的本子,以排印本代替武英殿本,不恰当,已要求其充分调查,再定底本。

No.362 陆九渊《象山集》。此书现有多种明刻本、清刻本,然校点者以《万有文库》本(排印句读本)为底本,非常不当,中心要求其仔细调查版本后再定底本。

No.366 薛季宣《浪语集》。最初以四库本为底本,以《宋集珍本丛刊》第六十一册所收清抄本、清光绪间里安孙氏治善祠塾汇刻孙诒让校核《永嘉丛书》本为校本。但根据出校

情况,孙校本更适合作底本。其一,四库本和清抄本在内容上有删改、漏抄,而孙校本皆不缺,比较完整。其二,四库本对“违碍”字样均有所改动,而孙校本基本保持原貌。其三,孙校本对抄写错误多有订正。现已改换孙校本为底本。

No.370 张栻《张栻全集》。《儒藏》精华编目录要求收入张栻全部著作,而校点者只交来《南轩集》,除此之外张氏还有《易说》、《论语解》、《孟子说》等五六种著作,应当全部收录校点。其次,《南轩集》选择四库本为底本,不当。根据校点说明,此书有两种明刻本、两种清刻本,校点者如果权衡众本,确定只有四库本文字最好,则可以选四库本。如果四库本没有这种文字上的优势,建议还是选择时代较早、错误较少、精校精刻的本子作底本。除考虑《南轩集》的单行本外,可以调查一下《张宣公全集》的版本,然后选择恰当的底本和校本。

No.375 真德秀《西山文集》。此书校点说明对该书版本介绍较详,出于文字清晰和内容完备的考虑,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但从校勘记来看,四库本对于“夷狄”、“鞑虏”等字多有改动,已非该书原貌,相较而言,明刻本更为近真,应选一校刻较早较精的本子作底本,内容不足者,可取《四库》本补充。

No.376 文天祥《文山集》。最初采用四库本作底本,但四库本对“违碍”字样均作了大量改动,且有不少缺文,与《文山集》原貌差别较大。现存《文山集》最早者为明代景泰本,内容完整,遂改为以景泰本作底本。

再以《十三经注疏》为例,阮校本并不是好的本子,前人如屈万里、傅增湘,今人如吕友仁,均有论断,《儒藏》校点邢昺《论语注疏》时用蜀大字本为底本也证明这一点。《儒藏》在校勘时对是否以阮校本作底本作了全盘考察,结果不以阮元校本(以宋十行建本作底本)作底本的有:

《周易正义》,注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作底本,疏用宋国子监刊单疏本。

《尚书正义》,用宋两浙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八行本)。

《周礼疏》,用民国董康诵芬室影印宋本。

《礼记正义》,用宋两浙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八行本)。

《春秋左传正义》,用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

《孝经正义》,用元泰定三年刻本。

《论语注疏》,用蜀大字本。

《儒藏》尚未交稿的还有一大半,希望校点者、部类主编严格把关,并遵守先交样稿和校点说明以供中心初审的规定,避免在底本的确定和校本的选择方面出问题,造成严重返工。

底本一定要是善本,上述底本改换的具体情况表明,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我们知道,善本的标准一般有三条,如张之洞《輶轩语》卷二《语学篇》所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足本、精本作为善本的标准不难理解,何以“旧本”也成为善本的标准?所谓“旧本”指时间早的本子,时间早的本子,一般来说流传过程短,辗转环节少,增加错误的可能性相对要小。具体就刻本而言,清人所说的“旧本”一般指宋元刻本和明嘉靖以前的刻本。之所以把旧本列为善本,前人多有论述,如卢文弨《书吴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后》说:“书所以贵旧本者,非谓其概无一讹也。近世本有经校讎者,颇贤于旧本,然专辄妄改者,亦复不少。即如《九经》小字本,吾见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锡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旧本之为可贵也。”(《抱经堂文集》卷一二)黄丕烈《宋刊本〈浣花集〉跋》说:“盖书以古刻为第一,一字一句之误,犹可谛视板刻,审其误之由来。故余佞宋,虽残鳞片甲,亦在珍藏。”(《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顾广圻《黄尧圃藏校本〈蔡中郎文集〉跋》说:“书以弥古为弥善(指传本),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乃世间有一等人,其人尧翁门下士也。必谓书无庸讲本子。噫!将自欺耶?欺人耶?”(同上)又如近人陈乃乾《与胡朴安书》说:“尝谓古书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误。出于无心者,如‘鲁’变为‘鱼’,‘亥’变为‘豕’,其误尚可寻绎。若出于通人臆改,则原本尽失。宋、元、明初诸刻,不能无误字。然藏书家争购之,非爱古董也,以其误字皆出于无心,或可寻绎而辨之,其为后世所刻之祖本也。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见之矣,而求其近于真者,则旧刻尚矣。”(见《国学汇编》第一集)由此可见旧本称善之原由。总之,从学术价值看,善本就是比较完足、错误率小(即使有错误,亦多出于无心)、文字较接近原著面貌的本子,既包括离成书时间较近的古本,也包括经过后人精校过的本子。

贯彻内容完足的标准,主要靠版本调查和比勘;其次也要参考文字情况,如果内容完足而文字较差,也可以进行变通,即选择文字好而内容不完足的几种版本进行拼合或互补。

贯彻文字错误率少的标准,主要靠校勘判断。如:

《周易注》,校点者原以《无求备斋易经集成》影宋本为底本,通过审稿,发现此本文字不如《四部丛刊》影宋本为佳,故决定改换底本。两本文字优劣情况,如:

原稿校勘认为底本“误”而改(补)之文字与《四部丛刊》宋本对比情况表:

	改(补)底本文字	所据版本	《四部丛刊》本
页 27,校记 3	改“也”作“地”	殿本、阮刻本	作“地”
页 40,校记 2	改“止”作“上”	殿本	作“上”
页 41,校记 2	“治”(疑误)	殿本、阮刻本等均作“治”	作“治”
页 43,校记 3	改“元”作“无”	殿本	作“无”
页 47,校记 3	改“利”作“亨”	殿本、阮刻本	作“亨”
页 48,校记 3	改“减”作“减”	殿本、阮刻本	作“减”
页 50,校记 2	改“钦”作“疑”	殿本、阮刻本	亦作“钦”
页 50,校记 3	补“或”([或]节或素)	殿本、阮刻本	有“或”,不脱
页 50,校记 4	改“饰反素故”作“饰终反素”	殿本、阮刻本	作“饰终反素”
页 53,校记 1	改“远”作“速”	殿本、阮刻本	作“速”
页 57,校记 3	“之”,底本原模糊(或作“在”),后人改动。校记又言:作“之”是。	殿本作“之”,阮刻本作“在”	作“之”
页 57,校记 4	改“已”作“厄”	阮刻本	作“厄”
页 58,校记 1	改“象”作“处”	殿本、阮刻本	作“处”
页 68,校记 1	改“服”(底本模糊,或系后人改)作“股”	殿本、阮刻本	作“股”
页 68,校记 5	改“齐”作“济”	殿本、阮刻本	作“济”
页 73,校记 1	“與”【当作(犹)“豫”】	殿本、阮刻本作“豫”	作“豫”
页 76,校记 3	改作“以”(原字不清,或为“于”)	殿本、阮刻本作“以”	作“以”
页 81,校记 2	改“防”作“妨”	殿本、阮刻本	作“妨”
页 90,校记 1	改“象”作“彖”	殿本、阮刻本	作“彖”
页 93,校记 2	补“以”	殿本、阮刻本	有“以”,不脱
页 93,校记 3	改“此”作“比”	殿本、阮刻本	作“比”
页 94,校记 1	改“乘”作“承”	殿本、阮刻本	作“承”
页 95,校记 1	改“含”作“舍”	殿本、阮刻本	作“舍”
页 103,校记 1	补“物”	殿本	有“物”,不脱
备注:共计 24 条,其中 23 条《四部丛刊》本不误而原底本误。			

又如《尚书正义》，阮本多误，而宋两浙茶盐司刻八行本不误，仅举数例：

(1)阮刻本《尚书正义》卷第九《盘庚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一句，孔传“马云《说文》皆云”。“马云”之“云”字显然不当，八行本作“及”。

(2)卷第十一《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一句，孔疏“對合，相當之事，故答為當也”。“合”字八行本作“答”。

(3)卷第十二《洪范》“一五行”至“五曰土”一段，孔疏“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者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者”字八行本作“著”。

(4)卷第十四《酒诰》“王曰封”至“显小民”一句，孔疏“皆由蹈行於為，畏天之罰已故也”，“為”字八行本作“道”。

以上均阮元底本误，其《校勘记》对这些讹误又未加以校正，实为失察。

异文判断不仅关系到确定底本，更关系到校定文字。校出的异文，情况往往复杂，要靠古文献学，特别是小学（语言文字学）的学识作正确的判断，然后决定弃取。最起码的要求：对待异文，一定要多查字典，据以作出判断，切忌相当然从事。

有的异文属于正误性质，准确加以判断，是校勘的首要任务。上面所举的例子主要属于此类。又如上次会议发言中提到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公冶长》“乘泡浮于海”，原校云：“‘泡’今本作‘桴’，泡误。古桴、枹同通，枹泡形近。”按，谓“泡误”，非，“泡”恰恰保存了古体。泡、桴古音近（泡，古音滂母幽部；桴，古音并母幽部；邻母，迭韵），可通假。“桴”之借字“枹”（bao 树木名称，又名小橡子），亦从包得声。又如同书《述而》：“若圣与仁，则吾几（岂）敢？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倦）”，原校云：“‘印’，今本作‘抑’。《说文》云：‘抑从反印’，作‘印’误。”按，谓“作‘印’误”，非。从声音看，抑、印音近可通（印，古音影母真部；抑，古音影母质部；双声，阳入对转）。又罗振玉把甲骨文“印”字释作《说文》认为“从反‘印’”的“抑”字古体，并指出“印”“抑”古本一字（增订本《殷墟书契考释》中54-55页），裘锡圭在《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也认为罗说是正确的（《古文字论集》252页）。按，甲骨文“印”字，从爪（手），从人（跪形），当为会意字，用手控制、压抑人之义。可见“印”实为“抑”之本字，原校判断为误字，是非颠倒，甚为不当。还有一处，笔者疑而未决，姑且提出以供研讨。如《宪问》“……（笔者按，阙文处今传诸本作“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君……（笔者按，阙文处今传诸本作“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校云：“君，今本作‘居’。君误。”按，君，尊也，主也。用为动词，“君于位”，即尊于位、主于位的意思，亦即忝居主位、不谦逊之意。疑“君”字未误，简本保存了《论语》文字的原貌，而作“居”反当为讹传或臆改之文，故“居于位”须增字为训方能解释清楚，如《集解》：“童子隅坐无位，成人乃有位”云云，把“位”解释为“成人

之位”。凡此有疑之处,以列出异同,存疑为妥,不当轻断是非,以“君”字为误。又罗振玉藏敦煌本《论语集解·为政》首章作“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君其所而□□□□’”,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校云:“‘君’,诸本作‘居’,底本当因形而讹。”按,疑敦煌本此处“君”字或亦不误,作“居”则同样为讹传或臆改之文,“君其所”即尊居君位、主居君位的意思,完全可以讲通。果若此,则为上述简本“君(于位)”字不误提供了有力的旁证,而且两处可以互证。

有的异文看似两通,但实际上只有一种符合原貌,只是一时尚无依据做出判断罢了。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应尊重底本,不轻改底本文字,出示它本文字。

有的异文属通假字关系,不在校勘范围之内,以底本为准即可。但有个前提,事先必须有准确的判断,如果判断错了,也会造成误校,或在本字、借字上取舍不当。具体例子详后。

有的异文属古今字关系,但孰为古字,孰为今字,也要判断准确,否则也会作错误的取舍,或作错误的解释。如《论语集注·阳货》“礼云礼云”章,底本(宋当涂郡斋刻本)中朱熹引程子曰:“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如置此两倚,一不正,便是无序。”《儒藏》精华编初稿原校改“倚”为“椅”,云:“‘椅’,原作‘倚’,据残宋本、元甲本、司礼监本、吴刻本改。”其实“倚”为椅子之“椅”的本字(唐宋古书中习见,如《朱子语类》等),其义由椅子有靠背可倚靠引申而来。而“椅”本为一种树木的名称,后借为椅子的“椅”,又因其有“木”旁,遂误为木制椅子的本字。故改“倚”为“椅”,属本末倒置。《儒藏》定稿不改底本“倚”字,出校云:“‘倚’,残宋本、元甲本、司礼监本、吴刻本作‘椅’,系后起借字。”又如《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原校关于“省文”的解释,《泰伯》:“唐虞之际”,注校云:“吴为虞之省。”其实“虞”古作“吴”,见《集韵》。而云“吴为虞之省”,似乎先有“虞”字,后有“吴”字。如以《集韵》为不可尽据,至多也只能因声求义断为通假字,而不可拘泥于字形说成省体字。又《子罕》:“印之迷高”,注校云:“印,今本作仰。仰省亻旁。”似乎先有“仰”字,后有“印”字。其实“仰”古作“印”。如《说文》:“印,望也,欲有所庶及也。《诗》曰:‘高山印之。’”段注:“印与仰义别,仰训举,印训望。今则仰行而印废,且多改印为仰矣。《小雅·车辇》:‘高山印止’,笺云:‘印,慕。’”又《玉篇》:“俯印,印,今为仰。”亦以为“印”在先,“仰”在后,为古今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类似这样的误校,均为《儒藏》精华编新校点本所摒弃。

《儒藏》精华编的校点一定要参考已出版的整理成果,但是要订立更高的标准,力争从整体上予以超越,有所创新。校勘方面的创新,关键也在于底本确定的正确和异文抉择的得当。

本文前一部分,已经涉及这一方面的例子,如所举《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新校本及邢

昺《论语注疏》新校本等,即属超越前人成果。这里再补充一些例子。

关于底本的确定的例子:

如《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原已出版过,整理者为陈俊民教授。《儒藏》所收本仍请陈俊民教授负责整理,他不仅按《儒藏》凡例对原书作了通改,而且其中的《礼记解》换了更好的底本,《文集佚存》大量作了补辑,辑和校均比原书有很大提高。

又如张载的集子,中华书局1978年已出版《张载集》,由章锡琛点校,至2006年已印刷三次,影响颇大。中华书局《张载集》较前人编的本子,确有进步。如关于内容编辑,其《编校说明》云:“一、现存的张载著作,有吕柟的《张子抄释》、沈自彰的《张子全书》、张伯行《正谊堂丛书》所收集《张横渠集》等,以上所存各本,内容往往重复、沿袭,甚至还有漏略。这次编校张载著作,和现存各本都有所不同。除了对原书卷次篇目作了改动外,还增补了若干材料。首先,把各本第一卷朱熹注释的《西铭》,归于《正蒙》,并删去了朱注。其次,把《易说》列于《正蒙》之后,又因从宋代《直斋书录解题》到清代的《四库总目》都称《易说》为《横渠易说》,而恢复旧称,《经学理窟》虽和《语录》相近,但已略作分类,较为条理些,所以列为第三。第四则是《语录》,原书各本《语录》,大体是沿用吕柟的《抄释》,现以南宋吴坚的《张子语录》为底本,吴刻本比《抄释》内容多出三分之二。但《抄释》最后七条为吴刻本所无,今将其附录于《语录》部分的最后,并把见于《抄释》的各条下,都标以星号,以示区别。原集《文集》部分,连《杂诗》在内,仅存十篇,现又据吕氏《文鉴》补入四篇,改称《文集佚存》,列于第五。最后,附入旧有的《性理拾遗》、《近思录拾遗》。此外还收集了《行状》、《史传》及各本序文,作为本书附录。二、本书以明万历四十八年沈自彰凤翔府《张子全书》官刻本清初翻刻本为底本,用郾县本、朱轼刻本、《正谊堂丛书》本及《张子抄释》等互校,同时以《周易系辞精义》(古逸丛书本)参校,书中各篇互见的文字也作了内校。”这两条凡例是该书编校的主要原则。第一条涉及对原书的改动和重编,主要有几点:关于改动之处:(1)把第一卷朱熹注释的《西铭》,归于《正蒙》,并删去了朱注;(2)把《易说》一书的名称依照传统著录改为《横渠易说》的旧称。关于改换底本的情况:以更为完足的南宋吴坚编刻的《张子语录》替换原书沿袭吕柟《抄释》的《语录》(吴坚的《张子语录》比《抄释》内容多出三分之二),将《抄释》多出吴刻本的七条附录于《语录》部分的最后。关于补遗情况:原集《文集》部分,连《杂诗》在内,仅存十篇,现又据吕氏《文鉴》补入四篇,改称《文集佚存》。就以上情况而言,把《西铭》归于《正蒙》是对的,因为《西铭》是被二程从《正蒙》中割裂出来的(按,不仅有《西铭》,还有《东铭》);以吴坚编刻的《张子语录》替换原书沿袭吕柟《抄释》的《语录》,也是对的,因为不仅吴坚本内容多,而且是宋本,文字也更为可靠。但是第二条写的又与此相矛盾,因为既然对原书各本有所改动和撤换,就不能笼统说仍以

属于原书的一种本子——沈自彰刻《张子全书》本为底本，而应把已改动或调换的本子排除在外。

《儒藏》所收的张载著作，由陈俊民教授整理。陈教授详细调查了张载著作的流传情况，并参考中华书局《张载集》的整理经验和成果，特别是受其调换个别底本的启发，提出了重新编校张载著作的意见，并且作出了初稿。北大《儒藏》编纂中心审读初稿之后，又提出了修正意见，最后双方共同商定了张载著作的编校方案：（1）参考明徐必达《张子全书》及沈自彰《张子全书》（二书属同一系统）的结构和编次，重新编纂；（2）凡有宋本传世的张载著作，尽量采用宋本替换相应的《张子全书》本，并校以有代表性的本子；（3）对《张子全书》中的辑佚部分进行补辑，对其附录部分进行补充。具体做法如下：第一、《正蒙》、《经学理窟》，是张载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均以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闽川黄壮猷修补刻印的《诸儒鸣道集说》本（藏国家图书馆）为底本，校以明徐必达本、沈自彰本、明刻本《张子抄释》，参校《宋文鉴》、《宋元学案》、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徐本、沈本据程朱学派从《正蒙·乾称篇》中抽出的《西铭》（朱熹注）、《东铭》，归入《附录补》（详后）。第二、《易说》改称《横渠易说》，其上经、下经及相关传文部分，以徐本为底本，校以沈本，《系辞》部分仍以徐本为底本，校以朱熹《周易系辞精义》，凡底本经文有误者，校以《十三经注疏》本《周易》。第三、《张子语录》，以《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吴坚刻本为底本，校以《诸儒鸣道集说》本（以下简称鸣道本），参校《张子抄释》、《伊洛渊源录》、《朱子语录》等。《张子语录》在南宋有两种本子，一为鸣道本，收在《诸儒鸣道集说》第十六至十八卷中；一为吴坚刻本，即《四部丛刊续编》的影印底本，《续编》影印本卷末附有张元济写的《跋》和《校勘记》，据此可知吴坚刻本确为善本，张氏校勘亦颇精审，可资借鉴。第四、关于文集的辑佚。张载文集早佚，朱熹曾搜集、校补《横渠集》，无版刻传世。徐本《文集抄》仅收文9篇，诗15首。中华书局又据《宋文鉴》补入4篇，改称《文集佚存》。今据《宋文鉴》、《永乐大典》残本，并稍事校勘，较徐本增补文11篇，诗63首，总计文20篇，诗78首，统称《文集辑存》。第五、《拾遗》、《附录》及其补编。保存徐本原有的《拾遗》、《附录》，并稍事校勘。另据朱熹《论孟精义》辑出张载《论语说》、《孟子说》，据卫湜《礼记集说》辑出张载《礼记说》，统编为《拾遗补》，以次《拾遗》之后；并将搜集到的诸本《张子全书》的主要序跋、书目提要、张载主要著作《正蒙》的评论资料以及被程朱学派从《正蒙》中割裂出来的《西铭》（朱熹注）、《东铭》等统编为《附录补》，以次《附录》之后。第六、张载著作总名改称《张载全集》，既有别于《张子全书》，又有别于《张载集》。

由以上可知，经过改编的《张载全集》，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内容更加完整，版本更加可靠，编排更加合理。（按，此不违反《儒藏》凡例四所说“所收书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选编，不改编，保持原书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因为《张载全书》属于个人著

作总汇的“独撰丛书”，其中各种著作是相对独立的，各有其不同的底本，可以选择各书最好的底本重编重校；如前所述，是“参考明徐必达《张子全书》及沈自彰《张子全书》【二书属同一系统】的结构和编次，重新编纂”，二不是以《张子全书》为底本，故不违反凡例。而如前所指出的，中华书局《张载集》的做法却违反这种通例。）

同时《张载全集》校勘也更加精审，下面再着重介绍异文校定的情况：

以张载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正蒙》和《经学理窟》为例，如前所述，这两种著作均以宋鸣道本为底本，其文字确实佳胜，而习见之明本如徐本、沈本，则多似是而非之误。如：

(1)《正蒙·天道篇》：“阴性凝聚，阳性发散。……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阴为阳得，则飘扬为云而升。故云物班布太虚者，阴为风驱馥聚而未散者也。”末句中“馥聚”，徐本、沈本作“敛聚”。其实作“馥聚”是，“馥”有“久”义，见《广雅·释詁》，又有“蓄积”义，用此二义以释“馥聚”均可通。（且“余聚”为一成词（“余”通“馥”），见《周礼·委人》：“凡其余聚以待颁赐”，郑玄注：“余当为馥，声之误也。”）盖徐本、沈本不知“馥”字此偏僻之义，有揣测形义妄改为“敛”字之嫌。

(2)《有德篇》：“颜子于天下，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故恕于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于己者不辄贰之于后也。”其中“恕于人者”之“恕”，徐本、沈本作“怒”，盖涉《论语·雍也》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妄改所致。其实如作“怒于人”，已经是“迁怒”于人了，谈不上“不使（怒）加乎其（指别人）身”。后两句都是上承前两句中“不善”而讲的：前一句的“恕”，指《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不善，不使之加于别人身上；后一句虽然是“不贰过”的意思，而前一句的意思并不是《论语》中居于“不贰过”之前的“不迁怒”。

(3)《有德篇》：“‘敬而无失’，与人接人当也。”与，待也；接，交也。“与人”与“接人”并列，皆为“与人交往”之义，其结构与成语“待人接物”同。后句徐本、沈本作“与人接而当也”，疑先把“与”字误解为介词“跟”，随即把后一个“人”字妄改为“而”字。

(4)《经学理窟·义理》：“经籍亦须记得，……故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数。”“诵数”为成语，反复诵读加以记熟之义，出《荀子·劝学》：“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张子抄释》卷三《理窟义理第六》亦作“诵数”。徐本、沈本作“诵记”，显为不知出典而妄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徐本、沈本之误，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所沿袭。按，即使认为某个例子有两可之嫌，也应保留底本原文，出校徐本、沈本异文，绝对不应据徐本、沈本为断，轻改底本。校勘最忌似是而非的轻改，前人多有告诫之词，如彭叔夏误校《太祖皇帝实录》的“治□”为“治乱”，后得善本，乃为“治忽”（按，《尚书·益稷》成词，“治理及忽怠”之义），因而深叹“三折断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文苑英华辨证〉自序》），如顾广圻说：“予性

素好铅槧,从事稍久,始悟书籍之误,实由于校。据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类然,流俗无论矣。叔夏自序云:‘三折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何其知言也!此书乃校讎之楷模,岂独读《英华》者资其是正哉?”(《书〈文苑英华辨证〉后》)因此他奉行“不校校之”的不改字原则。

有的异文于义两通,应尊重、保留底本的文字,将校本的文字出校。如宋本《经学理窟·周礼》:“人主能行井田者,须有仁心,又更强明果敢,仍宰相之有才者。”末句的“仍”字,其用法与《论语·先进》“仍旧贯”同,当“因”、“依”讲,不过这里不是“因袭”、“依从”的意思,而是“依靠”、“凭借”的意思,与“宰相之有才者”构成动宾结构,施动者为人主。此段文字,后三句讲人主推行井田制的必备条件,其中“有仁心”和“又更强明果敢”,属人主本身所具备的品质,“仍宰相之有才者”,乃指人主需要依靠有才能的辅佐宰相,前两句讲人主“行井田”的主观条件,后一句讲人主“行井田”的客观条件。徐本、沈本“仍”作“及”,则为连词,以“有”为共有的动词,用“及”将宾语“宰相之有才者”与前两个宾语“仁心”和“强明果敢”并列连接起来。实则与于义两通的异文,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孰为原始面貌,孰为经过改动者,就上例来说,底本作“仍”当为原貌,徐本、沈本作“及”,或浅人不解“仍”字之义(较冷僻),据二字形近而妄改。又如宋本《经学理窟·义理》:“人之迷经者,盖已所守未明,故常为语言可以移动。已守既守,虽孔孟之言有纷错,亦不须思而改之,复去其繁,使词简而意备。”徐本、沈本“既守”作“既定”。实则“既守”、“既定”两通。“既守”,已经守住之义,前一“守”字为名词,即“已所守”之义,后一“守”字为动词,即守住之义。疑原貌作“既守”,徐本、沈本作“既定”,或系浅人为避两“守”字重复之嫌而妄改。

宋本还有不少属于同义词或通假字的异文,凡此应该作出准确判断,予以保留,而不应根据对校或他校材料轻易改动。如《正蒙·诚明篇》:“君子所性,与天地同流易行而已焉。”中华书局点校本依徐本、沈本,“易”作“异”。实则作“易”不误,“易”犹“异”,《国语·晋语五》:“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若中不济,而外强之,其卒将复,中以外易矣。”韦昭注:“易,犹异也。”又如《正蒙·中正篇》:“博文约礼,犹至著入至简。”徐本、沈本“犹”作“由”。其实“犹”通“由”,不必改作“由”,如《孟子·公孙丑上》“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又如《正蒙·作者篇》:“山榘藻悦,为龟藏之室,祀爰居之义。”徐本、沈本亦作“山榘”。中华书局点校本据《论语·公冶长》改为“山节”。实则“节”为假借字,“榘”为本字,均为“斗拱”之义。“榘”字亦比较早见,如《尔雅·释宫》:“栱谓之榘”,不一定是后起本字,所以不必据《论语》改为“节”字。

作为底本的宋本,也难免有讹误之处,对此则在取得充分证据的基础上予以校正。如《正蒙·太和篇》:“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人生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

之大义。”其中“人生物之万殊”一句,颇为费解。徐本、沈本“人生”二字作“生人”,则“人”与“物”并列,“生”与“人物之万殊”构成动宾结构,不仅文从字顺,义通理明,而且与下文“立天地之大义”成对。据此,显然底本“人生”二字互倒,以徐本、沈本作“生人”为是,故据以校正。又如同篇:“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以是知万物虽多,其实一物;斯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其中“斯无阴阳者”一句,在上下文中也费解。徐本、沈本“斯无”作“无无”,不仅文义通顺,而且与上文“无一物相肖者”成对。据此,则底本“斯”字为误,徐本、沈本作“无”为是,故据以校正。

如上所述,《儒藏》精华编新校点本《张载全集》,因为采用了好的底本,有了可靠的依据,加之对异文判断准确,取舍有据,既不受校本影响而妄改,又不拘泥于底本而袭误,所以保证了校勘的精审,超过原出版的点校本。

其它如《日知录集释》,原来已出版过,现在仍由原校点者整理。但校点者有恃于原有的出版基础,未作认真、全面地修改,结果书稿经过三次初审,三次退改,仍存在许多问题,正在进一步解决之中。又如阮元《揅经室集》,也已出版过校点本,原整理者以《四部丛刊》影印原刊初印本为底本(其中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二卷,诗十一卷,续集九卷,外集五卷,合计五十四卷),并称无其它版本对校。实则《揅经室集》存在不同的版本,各本虽均出自阮氏文选楼家刻,但由于刊刻时间有先后而出现卷数的差异,《四部丛刊》的影印底本并非最全的本子,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均藏有阮氏文选楼家刻六十三卷本,更为完备。故《儒藏》精华编所收《揅经室集》,拟以六十三卷本为底本,以《四部丛刊》影印原刊初印本为对校本,重新整理,并且订正已出版的点校本的误校和轻改。

例子尚多,兹不详举。众多情况表明,《儒藏》精华编所收之书,虽然有不少已出版过点校本,但仍然大有改进的余地,不可简单袭用,有的需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有的更需重新制定校点方案,整理出新的高质量成果。这正是《儒藏》精华编学术含量的重要方面,也是《儒藏》精华编所收众书版本价值的珍贵之处。

(注:文中改换底本情况统计表承编纂中心沙志利、谷建博士提供,《周易注》原稿改动文字与《四部丛刊》影印宋本文字对比情况表承编纂中心甘祥满博士提供。)

在杭州“2008《儒藏》主编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汤一介

2008年11月9日

各位教授专家：大家好！

首先谢谢大家！我的讲话不能叫做总结发言，只是讲一讲这两天对会议的一些想法和我的一些意见。我一向反对在学术研讨会上作总结发言，因为学术只能是大家在一起讨论，百家争鸣。所以我有一个说法，学术问题不能有一个指导思想，如果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无法百家争鸣。所以我在这里只讲一些我的意见，而且我不能把大家所有的问题都讲清楚，因为有些问题还要我们在会后研究一下，看看怎样做能更妥当一点。

我非常同意李明友先生的意见，就是我们的主编会议一次比一次好，杭州这次会议比深圳好，比上海也好。为什么我们的会议会一次比一次好，就是我们的工作一次比一次有进展，有了进展，就比较容易展开工作。这次会议我有一个总的意见，可以说，它是一次有成果的，有意义的，有希望的会议。为什么说是有成果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从领导上讲，教育部对我们这次会议非常支持。首先，教育部领导肯定《儒藏》编纂工程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不仅杨光同志这样讲，在北京，我们也曾向社科司张东刚副司长汇报过，他看了我们的成果，也认为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总之，他们肯定了《儒藏》的成就，从内容到印刷各方面对《儒藏》编纂都作了肯定。另外，杨光司长对我说明年年初将由教育部组织各合作单位主管行政的负责人和社科部部长或助手召开会议，明确这个项目的意义和重要性，从教育部在行政领导上支持《儒藏》工程工作。同时，他们承诺要加大经费的投入，加大多少虽尚未确定，但加大投入是没有问题的。再就是《儒藏》校点成果如何计算，将来评职称，评工作量，到底怎么算，教育部都要作研究。他们认为古籍校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著作成果。杨光司长已将这些事情交代给了马建通处长，让马建通处长负责具体落实。马建通同志向我说，他一定把这件事情落实作好。我想，从教育部讲，教育部肯定了这个项目，而且会给我们有力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从我们主编这一方面来说，大家提了非常多的好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第一条，大家都同意我们《儒藏》工作将来的成败、好坏在于质量，质量是第一的。只能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大力度，这是大家的共识。第二条，从各位部类主编的报告中可见，他们是非常认真负责地做这一工作，而且基本上安排了他们所负责的每一本书的进度。从他们安排的进度看，大概2009年至2010年是最关键的两年，是交稿数量最多的时期。这就说明，相当部分的部类主编对稿件进度都有很好的安排。第三条，部类主编非常注意培养人才，因

为除了专家参加这个项目外，还有很多研究生和并不是十分熟悉古文献整理的学者参加，他们在工作中得到了培养和提高。当然，我们《儒藏》编纂中心也是这样作的。我们的这些参加《儒藏》校点工作的博士生和年轻的博士经过两三年、三四年的锻炼，他们在逐渐成长，有的已成为骨干力量。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在大家的汇报中间，这些成果都可以说保证了我们这个工程顺利完成。第三，韩国、日本、越南学者的校点工作不仅启动了，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比如韩国学者，他们经过了二十八次关于定目的讨论。大家要知道，韩国的儒学派别很多，真正定出一个非常好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目录是非常不容易的。否则他们何必经过二十八次来定这个目录呢？最后总算定出一个目录，有这么一个目录，就非常好办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北京大学接待了韩国成均馆馆长、韩国的儒林领袖崔根德先生，我和他进行了交谈，他也非常重视这个工程。他请我相信，韩国一定支持《儒藏》编纂工程。特别是梁承武教授，他非常认真负责地作这个事情，很不容易。我有时觉得，他召开那么多次的会，召集那么多的人，我也参加过他的会议，能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这是非常困难的。日本的《儒藏》编纂工作，是由户川先生来主持，这次他因事没能来参加会议，但今天有两位日本的编委来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日本的目录定下来是非常早的，而且人员也都定下来了。而他们定下的目录，刚才日本学者也讲过了，他们的目录是一个革新的目录，是与过去目录不同的。它是要和中国文化相衔接的一个目录，这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工作。我们昨天和他们交换意见，希望由户川先生写一篇文章来讲他们的目录，包括他们为什么定这样一个目录，这个目录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和过去有怎样的不同，希望能编在我们的《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集刊中。日本的学者对于《儒藏》编纂这件事是非常认真来作的。谈到越南方面，他们已经有了成果，交来了一部校点稿，阮金山教授昨天还给大家演示了“喃”字的功能和含义，并答应提供给我们关于越南的儒学目录。这当然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成果，从教育部讲，从各位主编讲，从韩国、日本、越南学者与我们合作上讲，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从这些成果看起来，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说，《儒藏》这样一个大学术文化工程，应该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个是出成果，就是《儒藏》这部书。第二就是出人才，就是培养一些有扎实功力的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人才。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比我老一辈的学者很多都不在了，和我同龄的，也不行了，严佐之先生这批专家，年龄也慢慢大了。所以如果不再培养人才的话，将来《儒藏》工程也很难完成。因为《儒藏》工程我们说是2012年完成，但是大家也都知道，2012年真的完成很难很难，要靠大家的努力，2012年能否完成也是个未知数，还是要努力做才能实现。那么怎么办？必须培养人才。可喜的是，不仅我们北京大学，很多单位都注意在培养人才。我是搞哲学的，我的古文献功底是很薄弱欠缺的，因此深深感到，如果你真的想把哲学、文学或历史的研究作好，没有一定的古文献知识是不行的，所以需要培养人才。人才应该是复合型的，是古文献的人才，但知识面应很广，文史哲都应该知道一些，这样的人才将来才可能继续作这个工程。《儒藏》精华本作完，按计划还要作一个更大的《儒藏》大本。我们正在编《儒藏》

总目,仅经部这一部分的目录,大概就有两万余种。将来怎么做,这就需要非常多的人才。我们要明确的是,不仅要出成果,还要出人才。第三,要出经验。这么大的项目,怎么组织,怎么组织好。既能节省精力,节省经费,又能高质量把它作好,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组织模式才行。拿《儒藏》精华编来讲,编出来的本子,中国的这一部分,就有281册,再加上韩国、日本、越南的,大概至少接近400册,这比佛藏要大得多。佛藏正藏也就是120本吧,再作续藏,续藏作出来加起来也顶多是200本,道藏总共也就是46本,《儒藏》工程当然比佛藏和道藏大得多。那么,这么大的工程,怎么样把它组织好,我想组织大型人文学科项目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上面情况看,我们要注意这三个方面:出成果,出人才,出经验。那么这个工程才能说是真正作好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进一步作好《儒藏》,大概也只能提几点看法。第一点,要再一次明确校点者是第一责任人。选择校点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校点者水平有问题,责任心有问题,那《儒藏》显然很难作好,所以要明确校点者是第一责任人。我想,我们多数,至少相当数量的校点者都是能胜任的,都是很优秀的,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可能他手头的工作太多,顾不过来,因此会发生问题。当然,在校点者的选择上,也可能由于原来了解的不太充分,有一些是没有经过一定古籍整理训练的博士生。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儒藏》是一项庞大的重要的学术文化工程,要质量很高,又有时间限制,就会出现有些校点者很难胜任这一工作的问题。我们曾和一些部类主编讨论过更换实难胜任的校点者的问题。这两天讨论,有些部类主编说他们已经在换人了,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办法,有的校点者没有时间,有的确实是基础太差,因此不得不换人。当然,换人主要由部类主编来考虑,如果部类主编有需中心帮忙的地方,那么大家可以一起商量怎样来换校点者。还有一类情况,我们这个工程,校点者做出的书稿,初审大部分由中心完成,如果初审能够通过,就交给通审,通审都是请专家来做。有的稿子质量有很大的问题,常常多次退稿。第一次退稿后,校点者第二次拿给我们,仅改了我们看过的提了意见的部分,其他部分就没有改,只能再退稿。所以有的稿件,退稿三次仍存在很多问题,审稿专家甚至于给他改了上千处的问题,改得非常非常多,你再退给他就不好办。那怎么办?一些部类主编提议变更署名,要加上审定者,否则审定人的工作就无从体现。审定人确实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做,而校点者自己不做,又不好把他换掉,这点请主编谅解。校点者的问题应该明确,校点者是最重要的,他是第一责任人,他头一关做不好,后面就会成问题。第二点,因为校点体例已经定下来了,从原则上讲,大家还是应该按照校点体例。但如赵伯雄先生所说,可以稍微灵活一点,有的“校记”稍微多一点,但是不能违背了校点体例。如果“校记”和校点体例完全不一样,那是不好的,还是应基本上遵循校点体例,在此基础上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但不能说不要校点体例,抛开校点体例。如果他的校记很长,确实有特殊的学术价值,我们有简报,可以放在简报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刊物,叫做《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也可以放在这里,以表现他的研究成果。如《说文解字注》的一些相关校勘,确实有学术价值,但又有违于体例,删掉又可惜,怎么办?可以放在我们的简报和刊物里面。第三点,怎么利用

现在新编辑的整理本校点。利用前人已有的好的新的整理校点本,这毫无疑问当然可以,因为人家的成果你完全不利用,那是不对的。但还是应该找到已有的整理校点本所用的底本,再根据那个底本来吸收整理本的成果,不要直接用现在出版的整理过的标点本。因为我们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收录的书都是1912年前,就是清末前的。所以可以利用这些整理本,但整理本所根据的底本,你必须找到,要利用这个底本作底本,如果有更好的底本,那更好,如果没有更好的,就利用那个底本,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我们的体例要求来做。当然这还有一个问题,会上提到,有的先生也问我,有些书已有新的整理本,比如《二程全书》、《王阳明全集》,到底是用以前的版本呢?还是用现在的整理本?我们说,还是得用1912年以前的本子,我们不要用现在人作的,但可以参考。第四点,怎样利用电子版。我们本来说不要用电子版,后来有些校点者用了电子版,所以现在就说可以用电子版。可以用电子版,但必须提交电子版所用的底本,否则就没法对校以判断电子版稿件的错误率。电子版的稿件要保证质量,因为我们发现有的电子版脱漏、错误非常多,甚至到千分之一,因为电子版的书稿一不小心就会输入错误,错误一定要保证在万分之一以内。错误太多,等于我们又要校对一遍,那我们就不好办了,工程量太大。第五点,请各位部类主编审查书稿。过去我们中心有个缺点,就是中心有时候直接和校点者联系,而没有告诉部类主编。这个问题后来有所改正,但以后一定要加强和部类主编的联系。部类主编一定要看稿,如果我们和校点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仅要告诉校点者本人,同时也要告诉部类主编,让主编了解具体情况。总之,在校点的问题上,基本上是要按照体例的要求,多一点,少一点,灵活点,有点自由度是没问题的,但不能太多。有些稿件仅牵扯技术性的问题,技术性的问题比较好办,有校点体例可以遵循;如果牵扯到学术性的问题,我们中心不要妄下断论,一定要和校点者及部类主编保持沟通,共同讨论。关于版本的问题,我想赵伯雄先生的意见是很好的,后来严佐之先生又补充了一点意见。这样来做校点,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王承略先生写了五条意见,我觉得都可以考虑。第一条,在底本选择以前应该有一个关于版本的调查。第二条,通过初校选择比较好的版本,从版本的选择讲,恐怕也没有绝对好的本子,有时有些相对性。选择版本的时候,希望选择最好的版本是没有问题的,但最好的版本里也有错误,要选择比较好的可靠的版本。第三条,通过初校,要排除差的版本。第四条,如本书已有较好的整理本,尽量避免用整理本,而要用整理本所用的好的底本。第五条,选定底本以后,不要轻易更动,轻易更动是非常麻烦的。这些意见我觉得都很好,都很有意义。所以把赵伯雄先生、严佐之先生、王承略先生的意见结合起来,也许版本问题就会很好解决了。现在当然还有很多困难,因为我们不能掌握所有版本,有新版本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发现的新版本更好,那就还得换。所以这些问题只能互相谅解了,大家来讨论。第六点,中心收到稿件后,要尽早尽快的和校点者见面。我们确实希望尽早尽快的和校点者见面,我们将努力做到。有了问题,有了意见,有了不同看法要尽快沟通,不要压稿,在这方面我们有缺点,必须改。第七点,关于经费的问题。经费的问题会进一步解决,因为教育部领导已有承诺,要加大经费的投入,如有更大的经费投

入,我们的经费会多一些,问题会好办一些。但也有一条,我们不大可能 30 万字给 60 万块钱,那是绝对给不起的。但是大家要想到,我们这个《儒藏》工程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杨光司长讲,它是和我们民族复兴相联系的。因为民族复兴需要有文化的复兴才行,没有文化复兴作支撑,民族复兴就会落空,所以必须有文化的复兴来支撑。而中国有儒释道三家,从来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如果一个民族想复兴,而不能很好地培育它的文化根基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复兴是会成问题的。所以怎么来看待这个工程,它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和我们的民族复兴相联系,是和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相联系,是和传承我们的文化命脉相联系,是和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相联系。特别是张国有校长讲,儒家思想曾经对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法国启蒙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对伏尔泰都有很大的影响。它过去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影响,而在现实讲,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虽然我觉得文化发展是多元的,我反对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了,我们绝对不能有一个东方中心论,或者中国中心论,但中国文化在将来会越来越发生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儒藏》工程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经费一定要加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讲,《儒藏》工程如果作好了,是我们对祖国、对世界的一个很大的贡献,这样来考虑它,也许会更全面一些。第八点,我们想将来和校点者补签一个合同。为什么要和校点者补签一个合同呢?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护校点者的权利,校点者的权益没有合同保证是不行的。一方面可以明确对校点者的要求。因为过去我们只和部类主编签合同,可是没有针对校点者的权利和要求。对校点者的权利必须保护,对校点者的要求也必须明确,这样比较好办事,而且对校点者、部类主编工作也比较方便,否则部类主编也不好干。所以我们做这个工作,要切实保证校点者的权利,明确校点者的责任。第九点,我们的《儒藏》工程除了编纂还有研究的任务。我们前一段时间主要在编纂校点这一方面,对研究没有顾得上。在 2007 年时,中心决定在 2008 年开始工程的研究这一方面,因此发过一个通知给大家,请大家来做这个研究工作。今年,我们对“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丛书这个项目来进行申请,申请的人数 23 人。由于经费的原因,我们每年只能支持 5 人,这次 23 人,我们想既然这么多人申请,就不如把 2008 年和 2009 年作一次来评出。经过专家评审,评出 10 个或者 11 个人来,分 2008 年和 2009 年两年给予资助。对于没有申请上的,如果想继续申请,就希望他能考虑得更好一点,因为到 2010 年,我们还会作第二次申请。在编纂《儒藏》精华编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资助 20 本,他可以申请 2010 年的和 2011 年的,因为他申请的不一定是他已完成的书稿,是正在作的,没有完成的,我们给他的期限是比较长的,三年之内做出来就可以了。书的出版给以资助。关于这个项目还有一些问题,将来如果《儒藏》编纂中有一些很好的东西,比如底本非常有价值,校点也非常好,我们不能放在《儒藏》这部书里面,那么也可以申请这个项目,我们帮助出版。

最后我想讲讲中心的工作。《儒藏》精华编工作流程,昨天已给大家演示了,有什么建议,请提出。我们中心是新成立的单位,学校给我们六个编制,给我们一定的返聘的权利,我们可以返聘一些教授,一些退休的教授到我们这里工作,总共加起来也就十一个人,现

在要面对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的一共三十几个单位,面对接近三百人的学者队伍,这么大的工作量要我们来做,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我们也是新建的单位,不是有很多经验,特别我本人是作哲学的,对古籍整理没有经验,而且我在北京大学从来不担任行政上的工作,没有行政上的经验,因此组织这样一个大的项目,可能说是很不胜任的。我们中心这些年轻的同志,像谷建、沙志利这些同志,是非常辛苦的,这一点我有时甚至觉得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星期天几乎都没有,他们的职称将来怎么办?我觉得谷建在我们这已经四五年了,她的职称我们到底怎么给她定?非常多的问题。他们确实非常辛苦,由于人力不足,经验不足,难免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我自己应负责任,作得不好,这方面我们向各位主编表示歉意,确实没有办法。有些我们应该做好的没有做好,那应该作检讨。比方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注意到,有的稿件的样稿交到我们中心,几乎两年我们都没有答复,这样是绝不允许的,我们认真批评了责任人。这个我不知道,说明我检查也不够。另如在同一稿件上,红蓝笔迹的不同引起了混乱,这些本来应该检查出来,却没有检查出来,这些责任应该由我负责,没有真正负好责任,不应该发生的问题发生了,是不对的。当然,由于水平可能没看出问题,可能提出一些错误的意见,这个是难免的,因为水平有限,不是不认真。我们只能提高水平,不断改进工作才行,请大家谅解。比方说底本的印制问题,我们确实应该加快,但有主客观的原因,有些我们和国图及其他图书馆交涉多次,也都拿不到,非常困难,这是客观原因,但是也有主观上的原因,我们可以比较快拿到的没有及时拿到,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应该加快作。还有我们给各单位的校点者提出的意见,有些可能没有表达清楚,甚至在态度上不够谦虚,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同志都应该抱着谦虚的态度来和大家讨论,这样才行。所有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不能怪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非常辛苦,到我们中心来看一看,他们在非常努力地工作,星期天也不能休息,有的连爱人都找不着,这个事情很麻烦,责任应该在我,所以请大家谅解,谅解我们的困难。我们就那么几个人,一个新建单位,也没有太多经验,但可以负责任地、凭良心地说,我们是在兢兢业业地、尽心尽力地工作,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一定把这个工作做好,特别是很好地和大家合作。最后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更多地给我们中心提出意见,我们还是坚持每年都要开一次主编会,这样不仅是交流经验,不仅是提高我们的质量,还可以增进我们的互相了解,增进我们的友谊,这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时间太紧,我不可能说得很多,说得不当之处,还请大家原谅。

最后谢谢大家! 谢谢!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周粟 整理)